

文化  
中国与世界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张旭东 王安忆 著

# 对话 启蒙时代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阳 主编

---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

# 对话启蒙时代

张旭东 王安忆 著

---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启蒙时代 / 张旭东, 王安忆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7

(“文化: 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2952-2

I. 对… II. ①张…②王…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69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13 千字 图版 130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

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

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

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

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



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17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

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年中秋于杭州

## 目 录

### 成长·启蒙·革命

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 王安忆 张旭东\_\_\_\_\_ 1

### “启蒙”的精神现象学

谈谈《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张旭东\_\_\_\_\_ 61

### “谁”启“谁”的蒙？

关于《启蒙时代》的讨论

罗 岗 倪文尖 张旭东等\_\_\_\_\_ 101

### 虚构与非虚构

王安忆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座谈\_\_\_\_\_ 152

# 成长·启蒙·革命

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

王安忆 张旭东

## 一 “有写大东西的欲望”

张旭东：从《长恨歌》、《富萍》，经过《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你又转回到写60年代的上海。为什么会挑这样一群人物，写他们的成长、自我教育和“启蒙”？从题材上来说，最早说你是知青作家，有上山下乡的背景，但《启蒙时代》完全是在城市里面。从《长恨歌》之后你就被人认为是上海的代言人，但那个上海包括了49年前的上海。《启蒙时代》背景却是“文革”初期，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你是怎

么决定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王安忆：怎么想起来写这样一个故事？《长恨歌》之后，《富萍》《桃之夭夭》都是一些小长篇，十几万字。我非常重视的，不是你有一个大的故事要写，或者说你有一大段时间供你写，而是你有一大的欲望。写大的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大的欲望。前面几个篇幅都不是很长，故事都是比较轻盈的，到了这一个——2005年夏天开始动笔，这时候觉得有一种欲望，想写一个大的东西。有的时候事情是从外部来决定的，想写一个大的东西，先是规定了它的体量和内涵。于是，找到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这个年代的故事，我还没碰过。有些评论家，如陈思和说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我又回到原初写作状态，写和自己经验有关的东西。像《长恨歌》也好《富萍》也罢，和自己的经验是有距离的，是比较客观地写一个别人的故事。而我写作的开端是与自己经验离得比较近的。很可惜的是，当自己还不怎么会写的时候，消耗了很多材料，经验性的材料。比如说《六九届初中生》，那就是和自己的经验贴得很近的，里面的人物和我同年龄，经历的事件也差不多，但这种感性的经验在长期的写作里面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启蒙时代》的故事一方面是和经验有关，那个时代是我已经有认知能力的时代；另外一方面，又和我有点距离，因为小说中人物的经验是我不曾有过的，就我们所见，他们好像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而我是旁观者。

张旭东：我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六九届初中生》是在一个很个人的意义上展开的，是基于个人经验，熟悉的生活……但是你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再回到这样的年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这就不完全是一个纯粹个人的东西了，而是不可能不带有一种意识、表达的欲望，一种历史判断。有没有这一层因素？

王安忆：有时候我们受到暗示，所以就很难断言欲望一定是自然发生，其中有自觉，也有不自觉。自觉的是说想写大东西，从《长恨歌》以来都是写小的东西，就想着应该写大的东西了；不自觉的，就是那些受到暗示的结果。比如说，青春、文化大革命、激进政治，总是以重大意义体现在意识里。这些年里的价值观的变化，推动了现实批判的诉求，也是重大的。于是，你的欲望便扩大了。

张旭东：这次回国之后，跟一些人谈起过这部作品。我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它，但有些读者觉得，你在写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中有人会说，王安忆

对“文革”、上海红卫兵到底有多少了解，是不是真正了解？

王安忆：我承认是弱项。但是对他们理解的也不是完全认同的。这个小说里，我对自己有几个挑战：第一，我其实是不适合写历史事件的，从来不适合写大的事件；第二，我也不大擅长写男性。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凡是男性都很类型化，比如说《叔叔的故事》，不像写女性那么生动具体。这也是我一个不擅长的地方；再一个挑战是经验上的隔离。我确实没参加过红卫兵，你要说对红卫兵运动，我确实没有亲历的体验。但是对人们的质疑，我有两个回答：一个是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所见闻。每个人完全可能会有自己的描绘；还有一个回答是我和他们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人，也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不认为这场革命有多少思想的含量。当然我不能说我自己做过很多调查，只能说我做过了思考。这一个评价也许是不让亲历者满意的。

2007年“五一”长假在大连开《启蒙时代》研讨会，薛毅有一个对我的批评的发言。他对我非常不满意，觉得我的启蒙里面不包含毛泽东主义的启蒙。怎么讲，我觉得他是有点要重新塑造这场革命。薛毅是70

年代生人，离“文革”更远，他难免会想象这场革命企图汲取某种思想资源。我个人不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思想含量。我对当时的事情或者不了解，但是从以后来看，它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思想果实，甚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都是在当时那些没有品质的政治事件中遗留下来的。我并不是政治性非常强的一个人，也不太敢发表这种言论，完全可能有人运用更多的材料、概念来说明这场革命的意义。对于这场革命，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意见要发表。我也没有企图正面去表达这场革命，我没有身经其中。但是至少在上山下乡运动上，我汇入了文化大革命。

张旭东：我感觉这篇小说本不是要以现实主义手法去再现“文革”……更不是历史题材的小说……

王安忆：对，不是现实主义题材的。这场革命我觉得也轮不到我去发言。

《启蒙时代》写作和阅读有时候会有差异，这部长篇最早是在《收获》上发表的，所以我和《收获》的编辑是最早交流意见的。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哪些方面是你不够满意的？”我说我总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是第三章，舒拉、舒娅姐妹，珠珠、丁宜男，一串小女儿。可是很奇怪大家都觉得那一章是我写得最自



如的一段，认为这一段最有趣味，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和熟的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不满意，可能是太熟了。没有新鲜劲，熟极而腻的感觉。但是又跨越不过去，我这个人发力比较晚，一般都是后发的，我一定要让南昌和这些女孩当中的某一个发生肉体关系，可是是谁，一直没有选择定，或者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产生。我特别需要事实的合理性，不肯迁就，准备过程难免冗长，先写的是舒拉，又写了珠珠，然后丁宜男，最后是嘉宝。就想把那个过程快点过完。

张旭东：对，写的像是一个梗概。就好像对课上的学生说，反正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给几个词交代一下，有很多类似梗概和提示这一类，另有一些是新鲜的东西，客观造成什么效果呢？我给你写过 E-mail，说《启蒙时代》跟《长恨歌》相比，是个大东西，而《长恨歌》是个相对比较小的东西。在形式的那个最基本的意义上，《启蒙时代》有点儿像你所有小说的一个总汇，提要，index，索引，目录，从中可以引发出去，找到你其他小说内容的原点和原型。它也好像在告诉读者，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如果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感到了什么，你想再多读一些的话，你可以去读王安忆的其他的作品，比如《长恨